国学 文化周刊

走进《庄子的世界》

■方 铭

《庄子》一书是由庄子及其弟子、后学乃至其他学派的文章汇编而成的,庄子的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实际上,最能体现庄子思想的,只能是《庄子》内篇。两千年来,众多研究《庄子》的学者一直在试图走进庄子的世界,而且也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了庄子世界的不同侧面,专注于《庄子》内篇研究的著作也有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如果说这些研究成果已经足以触摸到了庄子世界的全貌,似乎还是过于乐观了。王景琳、徐甸的新著《庄子的世界》,将《庄子》内七篇与外、杂篇分离开来,并就内篇所阐发的庄子思想、体现出的庄子精神、构建出的理想与现实社会,及其创造出的各类具有象征意义的群体视为一个独立且完整的庄子世界来加以研究分析。作者采取边注边议边评的写法,以明快轻松的行文,不但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庄子的世界,而且引导读者一步步走进这个"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且"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又"以与世俗处"的庄子世界。

既然是世界,那就一定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庄子的世界》一书的独特之处,首先体现在作者把出于庄子本人的内七篇视为一个环状结构的完整世界,而内篇中的每一篇,既相对独立,又与其他六篇首尾相接,环环紧扣,循环往复,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涵盖理想、精神、思辩、社会、人生、体认、修行、处世、治世等人生社会各个层面的完整的立体化的庄子的世界。

作为开篇的《逍遥游》,庄子先构建出了一个超然世外的"大漠之野""藐姑射之山",那里有着为君的无名圣人、为臣的无功神人、为民的无己至人,这是庄子的理想世界。紧接着第二篇《齐物论》先以形而上的思辩论证这个理想世界存在的哲学根基,再由纯思辨逐步走向世俗人间,回到任何人也无法置身于外的现实世界。于是就有了在现实社会中象征着"无名圣人"的君主尧,有了《大宗师》中既有圣人之才又得圣人之道的君主卜梁倚,也有了具有"无功神人"特点的众多臣子以及《人间世》中的各位君子士,有了顺时顺境而生却一个个不同凡俗的"无己至人",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大宗师》中的子桑户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现实社会的展示,庄子的世界最终在《应帝王》中完成。所谓《应帝王》,作者认为其中包含了两重意思。其一是为民者如何应对帝王,其二则是为帝者应如何为帝王。《应帝王》中所描绘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与《逍遥游》中的"大漠之野""藐姑射之山"遥相呼应,而《逍遥游》中的"天池""南溟""北溟",在《应帝王》中则化作了人间的"南海"与"北海"。《庄子的世界》的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剥茧抽丝式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庄子从理想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心路的发展轨迹,说明庄子是如何以《应帝王》中"浑沌之死"的现实回应《逍遥游》中"窅然丧其天下"的理想,表现出他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深刻思索以及对无法挽救的当今社会的清醒认识。

由于准确把握了内七篇的环状结构,《庄子的世界》作者总能在庄子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行文中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例如《逍遥游》以一系列精比巧喻、否定鲲、鹏、小鸟、草芥,并推出圣人、神人、至人之后,然后用几则寓言阐释圣人无名与神人无功。而《齐物论》则紧承《逍遥游》尚未提及的"至人无己"而来,论说如何才能进入无己的"吾丧我",说明万物不齐、物论不齐正是由于人有"己"、有"我"与"成心",才导致了世界的混乱。如此,《逍遥游》中最为重要的论题"至人无己"便在《齐物论》中有了形象的体现,有机地结合起了"逍遥游"与"齐物论"两个世界。再如《大宗师》与《应帝王》,这里不妨直接引述作者在"应帝王的世界"一章开篇的一段文字:"庄子在《大宗师》中写到的两个人物与《应帝王》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位是具有圣人之才的卜梁倚。……而另一位,就是那个发出'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的质疑,并最终将这一切归结于'命矣夫'的子桑。子桑,显然有悖于庄子一贯描述的得道者的形象。问题是,庄子为什么要把一向重精神、'游于形骸之内'的人置于如此贫困窘迫的绝境?为什么要发出'父母岂欲吾贫哉''天地岂私贫我哉'的诘问?从这大声诘问的呐喊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庄子实际上已经对这两个问题做了回答:那就是使我'贫'且无法活下去的,不是父母,不是天地,唯一可能的只能是'人'。而在现实社会中,能与'天地父母'相提并论之人,除了君主帝王,别无他人。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理解庄子为什么要写子桑了。子桑,实际上起着上承《大宗师》、下启《应帝王》的作用。"

《庄子的世界》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对《庄子》内篇的研究成果,并在其基础上对《内篇》一些章节中存在着较大争议的问题或一直存在的认识误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甚至在句读上也颇有创见。其中一个主要贡献是厘清了生活于"大漠之野""藐姑射之山"的圣人、神人、至人与现实社会中的圣人、神人、至人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庄子深知自己所构筑的理想世界的虚幻,于是在《逍遥游》其后的六篇中,着重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并把那个往见藐姑射之山四子后的君主尧以及经过"外天下"之后既有圣人之才又得了圣人之道的卜梁倚当做现实社会中的理想圣人来描述。庄子认为这样的圣人君主是可以灭人之国,戮人之民,却是"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大宗师》)。然而,庄子也承认这样的圣人君主只能是"万世之后而一遇",于是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君子士"与普通人身上。如《人间世》中的颜回、叶公子高、颜阖、蘧伯玉等,就属于处于暴君统治下,却要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又得以安身立命、保全自己的现实版"无功神人";而《德充符》中的各个"兀者"就是现实中"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无己至人"。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混淆了庄子理想世界与现实社会中圣人、神人、至人间的关系,因此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庄子》中所提到的种种与"无名圣人"行为不符的有关"圣人"的文字是"错入"的段落,而《庄子的世界》则解决了庄子理想与现实世界中圣人、神人、至人特征描述不统一的问题。

这样有创见的看法,在《庄子的世界》一书中还有很多。如在"大宗师的世界"一章中,作者有理有据地论述了所谓"真人"就是《齐物论》中所说的"古之人"。其为人师时是真人,如《德充符》中的兀者王骀;不为师时则是至人,如支离疏、哀骀它、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子舆等。同时,作者还对庄子的师承、特别是与孔子、颜回的关系、"道"与"德"的关系问题以及庄子对古代神话的运用改造等也都引经据典地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对一些固化的句读,作者也依据翔实的文献考据,大胆提出了新的见解。如《逍遥游》中的"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各个版本的句读皆如是,而《庄子的世界》却断为"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将"背"字属上读,这样一来,大鹏的"有待而行"便显而易见了。此外,作者对《庄子》内七篇题目的讲解,也博采众家之长,又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说,颇有新意。

《庄子的世界》的第三个特点是以轻松流畅的行文、简洁明快的笔调解庄子、说庄子,注庄子,从而把原本古涩艰深的庄子之说化为今人易懂的生动表述,可以让人更好地领略、欣赏庄子学说的魅力。例如,在评说《逍遥游》中"蜩、学鸠"等"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知至控于地而已矣,悉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时,作者是这样说的:蜩与学鸠,"周围司空见惯的都是与自己一样的普通生命。这里没有多少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有的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普通生活。因而当他们见到鲲鹏轰轰烈烈的南行之举时,免不了会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评论一番。它们并没有想去改变什么,也无意于比较自己与鲲鹏之间的'高卑''优劣'。它们只是把对鲲鹏南徙之事作为自己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一份快乐罢了。这,就是蜩与学鸠最真实、丝毫不作假的生活。仅此而已。"

此外,作者还根据每一章主题的需要将一章分做若干小节,每节长则两千、短则一千来字,每节的小标题都用浅显生动的语言点明该小节所要阐释的主题,既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作者倾向,同时又起着"画龙点睛"的妙用。如"鹏也有所待"一章就包括了这样几个小节:"鲲是鱼卵""鹏是骑在风背上的""天上地下都一样""大鹏到了南冥又会怎么样"等等。通过这样的小标题,读者马上就可以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不由得要去一探究竟:原本其大不知几千里的大鱼,如何变成了微不足道的鱼卵?那扶摇直上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的大鹏,又为什么是骑在风背上的?再如"蜩、学鸠与斥鴳"一章中的"蜩与学鸠是什么样的形象""庄子是否真的轻视或者否定蜩与学鸠""知足常乐、安然自得的人生态度",仅仅是这几节的小标题,就足以显示出作者是以一种轻松调侃的心境,与庄子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兴趣悠然的对话。

即便是深奥艰涩如《齐物论》,作者同样是以一种明快轻松的笔触娓娓道来。如对于《内篇》极其复杂难解的两个概念"真宰"与"真君",小标题索性就直接用了"真宰是什么?真君又是什么?","若有真宰:真宰是谁","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又是谁",还有"喜怒哀乐:'我'之根源""与物相刃相靡:人生之大哀"等,从中不难看出作者为让更多的人读懂庄子、欣赏庄子所作的努力。而且这种短章节的写作风格,也使得有大块时间的读者可以一口气读若干章,却不觉得冗长;而对于那些没有大块时间的读者,只需要花上十来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读上一小节。如此一来,洋洋几十万字厚厚的一本大书,但却做到了雅俗共赏:饭后可读,品茗可读,乘车可读;学者值得读,普通读者也能读得进去。

总之,《庄子的世界》是一部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的精品。王景琳、徐甸两位学者都是七七、七八级的本科生,又都是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生。王景琳教授曾随北京大学中文著名学者褚斌杰先生治《庄子》和先秦两汉文学,徐甸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的高足。这些年,虽然他们在海外任教,但一直没有放弃对《庄子》的研究。这部书凝聚了两位学者几十年做学问的功力,无论是对资深的庄子研究者还是文史爱好者,一卷在手,都不会令你失望。当然,《庄子的世界》也并非十全十美,书中还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例如对大鹏、蜩、学鸠、斥鴳的看法,圣人、神人、至人与现实世界的对应,以及真人即大宗师的说法等,尚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庄子的世界》自2019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登上了同年12月的"中国好书"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书在庄子研究领域的价值,说明这部书的确为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庄子的世界开辟了新径。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教授)

一代名相耶律楚材的历史担当

■傅秋爽

耶律楚材像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出自北宋名相范仲淹之口。类似的话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早就说过"进则救世,退则救民"。元代耶律楚材既是千古名相,又是才具非凡的良医,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大黄愈疾的传奇。丙戌年(1226)冬十一月,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部攻打西夏重镇灵武,城陷,诸将疯狂抢掠财富。唯耶律楚材"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大黄,是一味草药,并不名贵。放着金贵的东西不取,却弄些不值钱的草根根,众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不久军中疫病起,这个谜团才被解开。所谓疫病,就是恶性传染病,如曾发生在欧洲夺去过无数人生命的鼠疫、黑死病皆属此类。疫病一则传染性强,二则死亡率高,三则无药可施,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能够造成毁灭性灾难。中国古代疫病并不罕见。东汉建安年间伤寒流行,史称医圣的张仲景自述其二百多人的大家族在一场瘟疫中竟然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疾而亡。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之前被杀的孔融和病死的阮瑀之外,其余5人均在这场著名的瘟疫中染病殒命。曹植《说疫气》描述其时惨状:"建安二十二年(217),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沿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说,当时军中疫病初起,耶律楚材马上拿出之前搜集到的大黄施治,使染疾者数万人痊愈,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创造了流行病史上的奇迹。军中由此盛传他未卜先知,成吉思汗更赞其为"神仙"。懂医药的人都知道,大黄虽有泻热毒,破积滞,行瘀血之功效,但因其药力猛,伤人元气,使用不慎,可致人毙命,所以被归为"虎狼之药",一般人并不敢轻易施用。其实,耶律楚材敢用、巧用大黄,既非鲁莽撞大运,更没有什么神明指引。而是与他自幼博览群书、精进好学密不可分。《南村辍耕录》说他:"于星历筮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由此,他才对流行病发生、传播有准确清晰的预判,对预防、施治、用药采取了恰当果断的措施,才能够未雨绸缪,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像欧洲曾一次次发生过的那样颠覆人类历史的大灾难。

其实,耶律楚材的品德、胆识、才干、能力更多地表现在社会治理方面。他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担任中书令十四年之久,政令严明,肃然有序。1227年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窝阔台继位,耶律楚材奉诏回到燕京。时值金元交替之际,汉地的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燕京地区尤甚,地方长官贪婪残暴,杀人无数。犯罪团伙甚至到了"盗贼白昼剽掠富民财物,吏不能禁"的地步。耶律楚材认为维护好治安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必须敢碰硬,抓大案要案,才能安定人心。他首先严明法纪,下令地方官员没有朝廷指令不得私自征收百姓财物,凡是判处囚犯死刑,也必须报请朝廷同意,有敢违反者将被治以死罪。经他治理,贪腐之风有所收敛。经过深入调查,他很快搞清楚当时社会最关注的盗抢案竟然是地方长官之子勾结一帮权势子弟所为,于是不畏强权,冲破重重阻碍,将犯罪团伙的首犯十六个人正法,杀一儆百,产生巨大震慑,治安随之好转,当地生产生活转入正规。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生于燕京(今北京),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本人又是尊贵、显赫的金朝贵族,社会地位很高。十七岁时,耶律楚材以"宰相子例试补省掾"的成例出仕金朝。公元1214年夏,蒙古军队攻占中都(今北京)时,二十五岁的耶律楚材作为金留守尚书省左右员外郎驻守中都,始终恪尽职守。中都失陷后,元太祖十三年(1218)春,由于得到成吉思汗赏识,他开始了三十年出仕新朝的岁月,成为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在蒙元立国过程中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秩序建立和税制改革诸方面都卓有建树。政治上,在他的进谏下,推动蒙古统治者结束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度,转为适于农耕经济发展的封建管理;实行了财、政、军三足鼎立分治,遏制了地方分权势力的恶性膨胀;法律上,对蒙古习惯法中对有关难民、罪犯、俘虏、屠城等诸多法规成例进行了全面改革,这些举措,使无数因不熟悉、不了解这些律条的无辜百姓避免了严厉责罚甚至杀身之祸。仅是元兵攻占汴梁城那次,就有一百四十七万名因躲避战火而逃到城里普通百姓,因他对蒙元统治者的苦苦劝谏,而免遭屠杀。制度上,括户口籍为编民,便于管理;经济上,统一课税,制定了永额赋税,改变了统治者随性任意的无度掠夺,使严重的贪暴之风得到一定遏制。同时他对于汉文化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首先表现在对知识分子人才的保护和对人才的引荐方面。在蒙古剪灭金、宋的统一过程中,许多文化才俊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都因受到了他的保护而得以避免殒命战火。其次,他力图通过制度建设开辟儒学人才迈入国家治理的通道。1237年,随着蒙元统治疆域的扩大,急需大量治国理政人才加入到统治管理机构。耶律楚材不失时机地向最高统治者纳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通过考试,使得数千儒生避免沦落为奴,继续承担起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责任。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在忽必烈时代终于有所作为,成为一代名臣,为蒙元政权顺利完成由游牧社会体制转变为汉化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因为他的影响,蒙元政权逐渐了解了儒家思想对于政治统治不可或缺的作用,接受了他尊孔的文化主张。金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孔元措,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在中国历代上,元代给予孔子所上尊号是最为尊崇的;第四,他首创向统治集团进行系统讲经的制度,"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这对于蒙古贵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改变统治方式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第五,迅速恢复官办教育,在京城设置了国子学等。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战争中,过去蒙元军队所到之处,除了劫掠人口和财富,对于图书典籍等往往会付之一炬。耶律楚材对最高统治者反复劝谏,之后蒙元军队所到之处,古籍典章图书等得以搜集保存,避免了毁于战火。在灭宋战争中,文化辉煌达于历史鼎盛的南宋域内,大量的图书、古籍、印版多被搜集、保存,运回元上都和燕京,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另外,在他建议和主导之下,在平阳(今临汾)、燕京等地设置编修所、经籍所,整理、编辑、印刷各类经籍,促进了文化的昌盛。元代,燕京成为全国杂剧中心,而山东东平、山西平阳、河北真定(今正定)也成功跃居为次中心,究其原因,与耶律楚材昌明文化的一系列举措是分不开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元代之立国,凡军国大事,皆见耶律楚材规划之功。其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通过推行汉法,将蒙古政权逐渐纳入封建轨道,构建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模式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实质上都是儒家思想治国理念的具体体现。耶律楚材政治文化理念的形成,与他的家学渊源有直接关联。耶律楚材八世祖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聪敏好学,多才多艺,富于汉文化修养。《辽史》记载他"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耶律倍不仅本人是遵循儒家传统道德的典范,而且是汉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在他倡导下,辽历代君主无不尊儒重文,世代传承。

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通六经百家之书"为金朝尚书左丞相。他为爱子取名"楚材",期望他成人后能够楚材晋用,造福社会。耶律楚材三岁丧父,由出身显贵且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母亲杨氏教养。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博览群书,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确立了以儒学为宗、兼备诸家之长的文化思想根基。耶律楚材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踏入官场,危难之时,始终表现出一个臣子对朝廷应有的忠诚和对职责的恪守。第二年中都失陷,他正式皈依佛门,大德高僧万松行秀门下,废寝忘餐,苦修三年。这段潜心学佛的经历,对他一生影响重大。之后他应成吉思汗之召,开始此后数十年出仕新朝的生涯,始终以济世泽民为己任。耶律楚材一生功勋卓著,但对物质生活极为淡然,从政几十年,身边唯有素琴一张相伴左右。据《元史》记载,耶律楚材病逝以后,有人诬告说他高居相位多年,天下的财富,恐怕有一半都被他中饱私囊了。当权者于是命令近臣前往,结果看到他家中空空如也:"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元开国元勋一代名相耶律楚材之墓现存于北京,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